◓镜头故事

纽约城市规划不要“高大全”

一个多世纪以来,纽约市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交通、艺术及传媒中心,享有国际大都会、世界之都、不夜城等多项美誉,在传统“全球城市”中位居首位。

最近三十年来,纽约市已经成功实现城市转型,从“商业凋敝、公园荒废、社区破败、地铁崩溃、犯罪率极高”转变为“公交使用率70%以上、100多岁的地铁还在24小时不中断地服务乘客、犯罪率全美大城市最低、人均寿命全美最高”。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呢?从纽约的2007年版城市规划中或许能得到一些答案。

纽约人步行10分钟就可到达一个公园

纽约规划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本规划不取代城市的遏制犯罪、消减贫穷以及教育方面的规划,而是着重关注土地、水、能源、交通、环境等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建设问题”。

纽约的城市规划不讲“高大全”,而是紧密围绕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主题,将城市发展的近、远期需求有机结合,大到着手修订城市土地分区规划,小至改装市属公立学校的锅炉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出的各项规划安排具体、直观、明确,有着很强的指导性和现实意义。

如在住宅建设方面,规划提出为至少100万在纽约工作和生活的人提供经济上可承受、环境上节能低碳的住区和住宅。在开敞空间营造方面,规划提出让所有纽约人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一个公园。

在棕地治理上,将纽约市所有被污染的地块重新清理干净。所谓棕地,是指存在一定程度污染或环境问题被废弃的土地,以工业用地居多。

在废物处理上,规划提出对纽约市75%的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再利用而不是直接填埋等等。

对于绿化,纽约提出了具体到“棵”的目标:通过每条街道两侧“100%种植”,建设森林公园,在私人住宅、机构和空地种树,实现“再增100万棵树”的目标,以切实改善空气质量。

每项规划投资金和来源写得清清楚楚

纽约的2007年版城市规划共有127条具体举措,这个规划对于每一条举措将如何运作以及带来的影响都阐述得清清楚楚,无论是建设行动、政策措施,还是立法程序、行政手段等,都可以进行考量。

比如为治理交通问题,规划详尽地提出了试行“交通拥堵费”的措施,首先评估了伦敦、新加坡、哥本哈根等城市的成功经验,然后提出纽约试行“交通拥堵费”的区域以及收费标准、支付办法和支付程序等,最后估算出该措施将使堵车率降低6.3%,交通速度提高7.2%,并将产生的4亿美元收入用来改善公共交通的质量。

规划还详尽规定了规划实施的主体和保障措施,对于规划中的127项措施的实施主体,都一一落实具体的部门,如市政府、市议会甚至州政府、州议会及公共机构等,还明确提出各个部门的责任、关键步骤、节点绩效和经费预算等,让规划的实施一目了然、有条不紊。如“为每个社区至少修建或升级公共广场”的规划,指名交由纽约市交通运输局完成,并明确指出到2009年开发完成已确定的广场项目以及确定潜在新广场的选址,到2015年要建造10到15个广场,共需要市政府提供1.343亿美元。

规划中清晰的任务分解,让实施部门易于操作,让监督部门易于考核。规划中,对于每个项目,都标明资金的来源,如哪些是由政府投入的,哪些是由什么机构投入的,清清楚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政府到私营部门,从非盈利公共组织到普通市民对于城市发展的共同参与,这就使规划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政策。

制定规划时走访千余名市民和举行11次听证会

纽约规划编制过程的突出特点是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据统计,规划编制期间,编制组共走访了千余名市民、社区领袖和团体倡导者,会见了100多组社区团体,举行了11次听证会议。

通过密集的咨询会、听证会、访谈、问卷调查、媒体讨论、社区讲座等公众参与,形成社会共识。这个共识并不单指政府与市民间的共识,更包括了社会团体、专业组织、企业界等各个层面间的共识。这样,城市规划不仅体现了多元主体利益的诉求,也避免“闭门造车”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实施起来自然也容易得到全民支持。

◓海外轶闻

最忙碌母亲

英国妇女塔妮娅·沙利文总共生下11个孩子,可谓是“光荣妈妈”的典范。她在生下第10个和11个孩子(双胞胎)后仍不嫌累。这位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可谓牺牲不小,她在生下第6个孩子的时候毅然放弃了作为顾问的工作。塔妮娅表示幸好孩子不算太过吵闹,不用整夜起来。她和丈夫现在不得不为家人购入一辆微型巴士,才能满足家人一起出行的需要,而他们一家的生活就像军事行动,每周要消耗20条面包和50品脱的牛奶。塔妮娅可以说是英国当之无愧的最忙碌母亲。

◓域外博览

英国女王手提包里的秘密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左臂弯中总挎着一个手提包。人们不免好奇:包中都装些什么?王室传记作家萨利·比德尔·史密斯在新书《伊丽莎白女王:王座之后的女人》中披露了女王手提包中的秘密。

周日放些零钞要去教堂捐款

史密斯在书中写道,女王挎着手提包的形象似乎已成为她的一种标志。白天出席活动时,她通常使用劳纳手提包,晚上则使用体积较小的晚装包。

史密斯说,像普通人一样,女王的包中总是放着些日常用品,包括老花镜、自来水笔、薄荷糖,不可缺少的是口红和一面小化妆镜,因为她进餐时需要补妆。她写道:“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一次在华盛顿‘夫人餐会’上拿出口红当众补妆,她告诉其他夫人:‘(英国)女王告诉我可以这么做。’”

史密斯说,每逢周日,女王会在包中放上一张折叠整齐的5英镑(约合8美元)或10英镑(16美元)钞票,以便到教堂捐款。

永远放个挂钩以免包掉地上

女王手提包中还有一件永远都不会少的物品:一个金属挂钩。无论在哪里用餐,她都会用这个挂钩挂手提包,以免包掉到地板上。女王表亲珍妮·威利斯一次接受杂志采访时提及:“我亲眼见到女王从包中拿出一个白色吸附式挂钩,向上面吐了点口水,然后把吸盘吸到桌面下。她把包挂在上面。”

不要小看史密斯披露的王室秘密,这是她多年搜集的成果。英国《每日电讯报》4日说,消息源是能够近距离瞄到女王手提包“内容”的人。

一名在王室服务多年的消息源说:“女王是一名非常实在的女士,她需要梳子、口红或面巾纸,如果没有怎么可以?”

提包传信号

2007年一本介绍伊丽莎白二世的书中披露,她的手提包具有“暗语”功能。当女王和客人们一起用餐时,如果她将手提包放在桌上,就意味着她希望在5分钟之后结束用餐,离开现场。当王室工作人员看到这个“秘密信号”后,会设法将女王的想法通知客人。

当女王和客人散步聊天时,如果她将手提包挂到一侧肩膀上,就意味着她想结束聊天。这时就会有工作人员上前加入聊天,从而让女王在不失礼的情况下离开。再比如,当女王参加一场宴会,身边的客人都殷勤地和她聊天。如果女王感到枯燥乏味,那么就会将手提包搁到地板上,发出“求救”信号。而如果她将手提包挎在左臂弯处,就表明她感觉聊天轻松快乐。

◓东张西望

车厢里用短信聊天

国内本科结束之后,我来到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业。由于对东京的地理并不熟悉,我一直很少出校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跟一个叫做羽田的东京女孩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帮助我更好地学习日语并能更快地了解东京。

第一次坐公车是去高尾山看樱花,羽田充当我的导游。我们搭上了去高尾山的公车,虽然是周末时间,但是车上一点也不拥挤。由于没有相连的空位子,我和羽田挑了两个前后相隔三排的位子坐了下来。车子刚一发动,我就忍不住向外张望。前后左右忙不迭地扫视着,干净而整洁的街道以及在国内从未见过的标志和建筑,惹痒了我的“话引子”。

我开口向羽田问道,高尾山的樱花和富士山的樱花有什么不同,这个时候看到的樱花是什么颜色的,偏深还是偏浅。因为声音并不算大,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没想到的是,一向开朗的羽田并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只见她掏出手机,低下了头。

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羽田的短信:高尾山的樱花有很多种,品种不同,颜色也不一样,这个时候有雪白色的,还有寒娇樱,火红的颜色,大山樱则是紫色的。还没看完,短信又来了,还是羽田的:把手机调成振动吧,你的手机声有些长。我好奇地问羽田,为什么还要发短信呢,要收费的呢。

羽田在短信里解释说,“没有人会在日本的公车上大声说话的,不信你看看。”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公车上,环视一番,车上的人都安静极了,坐在羽田旁边的大叔,翻看报纸的时候,动作温柔极了,一丝声音也没有。我前排的一对情侣,女孩靠在男孩的肩上,两人一直在欣赏着窗外的风景,也没有语言的交流。剩下的,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把玩着手机,还有的在闭目养神。车上静得像没有人似的,没有说话声,没有在车上吃零食撕拆包装袋的声音,甚至车上都没有车载电视,没有那吵人的广告。我甚至感觉空气有些紧张,我可以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你可以表达,可以大笑,但是不能打扰别人。所以在公车上,安静是最好的选择,日本人把安静的习惯养成了,带到了各个公共场所,即便那里可能空无一人,即便时间可能正是午夜。**(草予)**

德国:工商局长儿子开不成公司

表弟在德国汉堡大学商学院读工商管理硕士时,在一次学校周末聚会上认识了一位德国朋友费恩,两人就这样成了好朋友。和费恩交往近一年后,一天表弟在看一份德国的报纸时才惊讶地发现,费恩的父亲竟然是德国国会议员、德国工商总局(也称总会)的局长,一人统领和管理着全德80多个分局、近万工作人员的大官员,也就是说费恩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官二代”。

得知实情后的表弟开始纳闷——汉堡大学商学院并非德国最好的商学院,在全德高校商学院中排名只处于第9位,既然父亲都是工商总局的一把手,费恩干吗不让爸爸把自己弄进一个更好、更知名的商学院。当表弟对费恩提出这样的疑问时,费恩反而显得很诧异,他说:“这怎么能行呢?我水平不够,只配来这里读呀。你这种奇怪的想法从哪里来的?”

更让表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其实,费恩大学毕业后,本打算开一家小的广告公司,为此他之前就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可后来等到柏林工商分局申请营业执照时,才发现不行,开办新的广告公司的名额没了。在德国有这样一个规定,任何行业的企业数目都不能是无限量的,而是必须有一定的名额限定,如果已经满额了,就不能再新增了。费恩说,在他之前,柏林工商分局已经发放了500个广告公司的营业执照,这已经是他们的最高限定数字了,因此他不能再开办第501个广告公司了,否则就会造成供过于求,导致恶性竞争,破坏整个柏林广告行业的和谐和有序。

为此,费恩只能先在柏林工商分局申请着,然后等通知。所以,费恩只好选择进入汉堡大学商学院学习,一边学习,一边等待。表弟不解地问费恩,你父亲不是工商总局的局长吗,你身份和地位不一样呀,让你爸打一个电话,柏林工商分局他们还不“特事特办”?况且只新增1个名额,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听完表弟的话,费恩又是摇头,称,那不行的,法律没有赋予爸爸这个权力,他只有为企业和消费者奉献和服务的权利,要是真的这样做了,就触犯了法律,要进监狱的。

费恩告诉表弟,从小学到大学读的学校都是德国最普通的,根本没有一所名校,学校里他的档案上,关于父母,只要写上职业就可以了,不需要填写具体职务和官衔,因此,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只知道他的父亲是在德国工商总局上班,没有人知道其实他父亲是局长,他是一个“官二代”。